

脱贫边缘农户生计帮扶满意度评价 及返贫预防策略研究

——基于G县调查数据的分析

邢占军 林 杰

摘要: 基于G县调研所得的数据,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农户生计帮扶满意度评价体系,并对其影响路径传递机制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生存环境、人文发展和社会保障等对农户帮扶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应从生计可持续发展、思想观念转变和帮扶满意度提升等方面入手,实施多维提升策略以防范边缘户返贫。一是坚持推进“产业扶贫+产业兴旺”衔接,通过“社会输入型干预+农户内源式发展”机制有效结合驱动可持续生计发展策略,提振产业振兴功能。二是扎实推进“社会保障+风险预警”协同,加强对脱贫农户返贫诱因精准识别并分类施策,搭建以风险与可持续生计为中心的返贫监测预警框架,建立长期有效的帮扶信息动态管理机制。三是推动实施“组织振兴+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为引领重建村落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秩序,有效挖掘乡土文化资源,激发多元协同参与动力,以多方协同合力推动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关键词: 农户; 可持续生计能力; 相对贫困治理; 帮扶满意度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2.00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强调“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①。贫困问题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且错综复杂,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②。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我国实现了现行赤贫线标准下贫困人口的全脱贫,农村脱贫户及其需求发生了质的转变^③。衔接期内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均涉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仍然是一段时期内工作的重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动农业农村实现现代化,意在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这也成为低收入人口开发式帮扶的政策导向^④。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以后,防止规模性返贫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首要任务和底线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解决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脱贫边缘户(如残疾户、低保户、支出型困难家庭以及因病、因学等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历史性成就与经验研究”(21JZD014)。

作者简介: 邢占军,山东大学智慧国家治理实验室主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岛 266237; xingzhanjun@163.com);林杰(通讯作者),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岛 266237; linkzer@mail.sdu.edu.cn)。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2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

③ 邢占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理论学刊》2023年第3期。

④ 梁伟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历程、实践特征及世界意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大额支出造成家庭实际生活困难的人口和防返贫重点监测对象)的生产生活需求,化解潜在的规模性返贫风险,高度重视其有关生计帮扶策略选择的合理性,既是拓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之举,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①。要从“两不愁三保障”迈向教育、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服务等多方生计帮扶,及时并有效解决好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实现生活品质与生计帮扶满意度的有效提升。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滇桂黔”石漠化区村镇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立足脱贫边缘农户的基本生活条件、收入和支出状况、知晓度、满意度以及相关诉求等,精准识别农户生计帮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了解后脱贫时代该地区驻村帮扶的基本情况,寻求提升脱贫边缘农户生计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二、文献回顾及述评

(一)生计可持续发展与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与生计发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话题,各国政府也围绕反贫困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并给予政策支持。现有研究大多围绕农户生活发展、生计能力提升、社会福利与生计资源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反贫困策略展开学理诠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在物质、人力、社会、生态和其他方面的资源和能力。从狭义上来说,这一概念更加强调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资产以及行动组成,强化了生计与反贫困研究的范式分析^②;相对贫困这一概念源自社会比较^③,阿马蒂亚·森提出要从权利(或能力)相对剥夺的视角理解相对贫困,认为相对贫困是个人或家庭生计权利的相对被剥夺^④。近年来,随着我国消除绝对贫困问题,关于生计与相对贫困治理的讨论也日趋热烈。相比绝对贫困而言,相对贫困呈现出长期性、多维性、次生性、分散性、流动性和发展性等新特点^⑤。在对其评定与测算研究中,也出现较多具有鲜明特征的多维度指标。在1976年的研究中,阿马蒂亚·森首先从可行能力视角提出了可度量的公理化指标^⑥,之后学者们陆续从Ta指数、T指数、SST指数、综合指数法以及A-F方法等出发,探讨和研究影响生计发展与贫困治理的机制。有学者根据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实践经验给出了界定相对贫困的详细标准^⑦;另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后脱贫时代,脱贫攻坚的评估和制度建设应采用多维标准,既要反映“贫”之经济收入增加,也要反映“困”的社会文化发展,要注重从生态环境、生活状况等维度因地制宜设定多维贫困治理指标^⑧。事实上,对于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学术界已从多维度识别、监测预警与分类测度等出发,探索形成了不同的提升路径与策略选择^⑨,相关研究中的宏观政策视角比较丰富,既有扶贫理念、制度、技术、辅助等“四位一体”的研

① 叶敬忠:《中国贫困治理的路径转向——从绝对贫困消除的政府主导到相对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3期。

② 何植民、蓝玉娇:《脱贫“脆弱户”的可持续生计: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农村经济》2022年第9期。

③ 李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中国社会工作》1996年第5期。

④ 王小林、冯贺霞:《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3期。

⑤ 王晓毅:《全面小康后中国相对贫困与贫困治理研究》,《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0期;汪三贵、黄奕杰、郑丽娟:《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与未来取向——基于“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⑥ Sen A.,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76, p. 219.

⑦ 周力:《相对贫困标准划定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4期。

⑧ 王小林、张晓颖:《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解释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2期。

⑨ 唐丽霞、李小云、左停:《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贫困的三种分析框架及比较》,《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陈秋红:《农村贫困治理中的问题与推进策略——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苏芳、常江波、范冰洁等:《多维视角下相对贫困治理的中国探索》,《中国软科学》2023年第11期。

究,也不乏扶贫目标与机制调整的路径分析^①。政策实践与机制维度方面的研究着重强调要处理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通过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等手段推动扶贫资源配置落地,消除绝对贫困与缓解相对贫困^②。

(二)国际相对贫困治理及返贫预防的启示

从国际化、宏观的视角来看,以英国、瑞典、法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等主要 OECD 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相对贫困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模式和策略^③。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福利国家的社会帮扶政策以社会福利为核心,具有普惠性、覆盖面较宽等特征。如在住房保障层面,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后,重新向“人民之家”回归,虽从未大规模建造公有住房,却在住房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调节效果^④。此外,法国政府详细实施了“针对灵活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慷慨的福利计划引导农村人口就业”^⑤;21世纪以来英国工党通过将政府、社会、市场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来减轻对贫困边缘弱势人口治理压力,他们力图通过构建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普惠的社会福利体系,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缓解贫困^⑥。另外一种模式则强调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多元社会帮扶政策^⑦,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强调贫困问题的个人责任,政府主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农村公共工程与经济发展法案》(1965)、《农村发展法》(1972)、《农村基础设施改革法案》(1972)等^⑧,针对贫困边缘群体建立了以工作帮扶为导向的社会救助体系。根据 CEIC 数据库统计,联邦政府划定测算下相对贫困标准大概可以视为基于人均收入均值(12760 美元/年)大约 40% 的贫困线^⑨。由于美国主要以社区为单位开展贫困监测和返贫预防,而全美农村社区以独家独户为主,这也加重了对贫困监测、防返贫机制构建的难度^⑩。通过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食及农业组织、北美农业协会以及其他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等合作,各类非政府组织(NGO)实施了多项减贫项目。这些项目覆盖教育、金融、生态保护和社会救助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国际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防线。它们通过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基础设施改善和产业开发等方式,致力于精确识别并帮助相对贫困人口。各国政府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不仅广泛参与还提出了具体的减贫路径和解决方案^⑪。无论是差异化济贫政策,还是根据各阶段和地区特点制定的帮扶政策,都围绕着提升生计与发展这一核心目标,构建了多元化的社会支持体系。这些政策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并将其作为监测的重点对象,以确保援助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最终,这些措施被整合进不同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中^⑫,共同推动全面的社会包容与公平发展。

① 郑功成:《中国的贫困问题与 NGO 扶贫的发展》,《中国软科学》2002 年第 7 期;汪三贵:《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 30 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管理世界》2008 年第 11 期;张琦:《减贫战略方向与新型扶贫治理体系建构》,《改革》2016 年第 8 期。

② 叶敬忠、陈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顶层谋划、基层实践与学理诠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

③ 武洁:《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公共管理评论》2006 年第 1 期。

④ 刘玉安、蔺小英:《瑞典的住房政策及其启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 年第 1 期。

⑤ 赵迪、罗慧娟:《欧美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世界农业》2021 年第 9 期。

⑥ 刘玉安、徐琪新:《从精准扶贫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紧迫性》,《东岳论丛》2020 年第 2 期。

⑦ 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李秉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84—99 页。

⑧ 法案及政策来源:美国农业部网站(www.usda.gov),访问日期:2024 年 10 月 13 日。

⑨ 周力:《相对贫困标准划定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 年第 14 期。

⑩ 郑琼洁、潘文轩:《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视角》,《财经科学》2021 年第 11 期。

⑪ 郑瑞强、高驰:《扶贫治理现代化与国外减贫研究的进展和热点》,《江汉学术》2021 年第 2 期。

⑫ 赵迪、罗慧娟:《欧美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世界农业》2021 年第 9 期;王睿、骆华松:《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基于生境条件差异视角》,《求实》2023 年第 3 期。

(三)规模性返贫的诱因及预防治理

梳理以往对规模性返贫的相关文献发现,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内涵、诱因分类、防范治理等方面展开探讨。从贫困监测的主要特征来看,研究者们从就业、生活条件、住房、教育、健康、消费和财富等方面的指标衡量了农户的生计多维度贫困^①。张倩等针对中国偏远落后地区规模性返贫预防的研究认为,要结合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推进衔接乡村振兴发展下包含收入、生存与健康、教育、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多维度、全方位的标准和绩效评定指标^②。陈会方等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状况的多维测量,指出当前贫困状况主要呈现出绝对贫困人口集中、贫困发生率高、返贫率高三大特征,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较大,有个别地区出现返贫人数超过脱贫人数的情况^③。一些研究从返贫主体和致贫主体视角分析了两类人群的特征。潘文轩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提出了以相对贫困为方向、以多维贫困标准为核心的新标准,并从收入、生活条件、健康与医疗、教育和培训、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入等维度展开研究^④。此外,部分学者认为,个体的主观思想是致贫的重要原因,易返贫人口和易致贫人口都是成果巩固期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万兰芳等认为,中国新样态下的“非贫困时代”需要转向发展型福利治理逻辑,通过调动多方主体进行福利供给,提升贫困群体自身的脱贫能力,进而使相对贫困得到长期性和根本性的治理^⑤。张永丽等提出,应进一步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继续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的力度,不断提高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水平,从公共服务层面减缓相对贫困^⑥。以上研究从经济、生态、交通、社会等维度出发,丰富和拓展了农户生计帮扶满意度绩效评价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对于返贫预防及相对贫困治理的策略,王汉杰等认为,应建立规模性返贫的分类防控长效机制,从风险监测预警、风险防范化解及内生动力培育层面介入^⑦。童春阳等认为,在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后,应在过渡期内保持现行政策总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逐步建立统筹城乡的常态化减贫助弱机制,实现脱贫攻坚和减贫脱贫政策的无缝对接^⑧。曾庆捷认为,2020年后扶贫工作应从运动式扶贫走向常态化扶贫,常态化的相对贫困治理应更加强调普惠性而不是差异性^⑨。汪三贵等指出,相对贫困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发展^⑩。李小云等认为,对农村减贫战略需要由之前的“扶贫战略”逐步过渡转向“以防贫为主”的减贫治理策略;在“十三五”时期,政府和基层组织通过瞄准区域、瞄准群体而开展的开发式扶贫的效果越来越弱,2020年后应通过逐步实现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来缓解相对贫困^⑪。叶敬忠等指出,在相对贫困治理的新时代应科学设置一定期间为“过渡期”,

- ① Martha G. Roberts、杨国安:《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地理科学进展》2003年第1期。
- ② 张倩、马秋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构建》,《统计与管理》2018年第10期。
- ③ 陈会方、朱平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特征与治理转型》,《学术论坛》2016年第9期。
- ④ 潘文轩:《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及对2020年后解决相对贫困的启示》,《兰州学刊》2020年第8期。
- ⑤ 万兰芳、向德平:《精准扶贫方略下的农村弱势群体减贫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 ⑥ 张永丽、郭世慧:《农户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 ⑦ 王汉杰、袁铭璐:《新发展阶段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机制设计与政策保障》,《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 ⑧ 童春阳、周扬:《中国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地理研究》2020年第5期。
- ⑨ 曾庆捷:《从集中作战到常态推进:2020年后扶贫机制的长效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 ⑩ 汪三贵、刘明月:《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理论关系、战略转变与政策重点》,《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 ⑪ 李小云、苑军军、于乐荣:《论2020后农村减贫战略与政策:从“扶贫”向“防贫”的转变》,《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张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农业经济与管理》2022年第6期。

以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①。檀学文指出,相对贫困治理需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之下的常态化,并提出三条可行的思路:一是优化大扶贫格局,加强地方政府、社会力量的作用;二是向城乡统筹的制度化、法治化贫困治理体制转型;三是增强基层社会服务能力^②。

(四)文献述评

已有研究着重对生计与贫困的关系,国际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主张、经验和启示,返贫预防实施困境和诱因分类以及如何提升农户生计发展韧性等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不少富有价值的成果,其结论与观点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无论从中央的政策转向,还是从农户的现实境遇来看,农村脱贫边缘群体的脆弱性脱贫都是一个兼具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紧迫议题,关系着我国脱贫成果的巩固以及共同富裕的推进。但学界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内容上,探讨提升脱贫农户福祉影响因素及关联性问题较多,对脱贫户生计发展能力及具体策略的深入研究较少;二是研究视角上,侧重于政府、帮扶者、企业等他者的视角研究,从脱贫边缘户自身出发,基于个体能力视角研究脱贫边缘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较少;三是研究方法上,理论和个案分析居多,实证研究较少。另外,学界对相对贫困视域下脱贫人口发展生计、促进民生福祉等问题虽有所提及,但对脱贫人口特别是建档立卡脱贫边缘户的研究仍显不足。同时,将原有脱贫扶贫政策简单复制推广到后脱贫时代不具有可行性,原来的制度耦合性和系统联动性均有所欠缺,已无法适应当前发展要求。事实上,实现农村脱贫人口可持续生计发展仍面临着诸多考验:农村要素禀赋资源流失严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态与卫生条件脆弱、治理体系和组织能力弱化、文化日渐“凋敝”等问题突出,边缘贫困户的生计与生活品质有待提升。新形势下制约脱贫农户发展的深层矛盾开始显现,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脱贫边缘农户脱贫成效,有效提升他们的生计发展和生活福祉,成为后脱贫时代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下相对贫困治理和规模性返贫监测预防不容回避的工作难点。

三、G县脱贫人口生计发展与帮扶满意度指标构建

(一)G县地域空间格局及发展现状

本文所研究的G县位于以桂西村镇为代表的集中连片地区。囿于老少边山区地理位置、城市发展规划、历史变革等影响,该区域经济不发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公共资源缺乏,相对贫困现象比较突出。G县区域内相对贫困发生率空间地理分布与人口分布及当地自然地域性特征高度耦合,山地丘陵居多,以民族聚居区为多,脱贫攻坚的硬钉子呈团块状分布于地理区位的边缘位置,各个集聚点亦存在分割特征,交通可达性和公共服务水平不高。自然地理环境条件较差,资源禀赋、资金技术和市场化风险问题长期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伴随精准扶贫拔除“硬钉子”,贫困发生率相继呈现散点状分布。调研中发现,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各村庄所在的贫困发生率常常与耕地资源相挂钩,除去半个湖盆状的河套地区过渡地,干净水源分布少且集中,其他区域开垦地资源有限且大片土层瘠薄、土壤质地及丰沃程度较差,住户居住位置比较分散且偏离主要聚居区。综上,G县调研观测点的这些村庄社会和地理条件复杂,位于革命老区、以壮族为主体的民族聚居区以及山区位置,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相对薄弱。受自然灾害等影响,生存环境条件恶劣、生态脆弱,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二)基于DFID框架的脱贫边缘户生计发展情况

参考刘玲等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给出的经济影响条件,其中最直接相关的生计指标便是年收入

① 叶敬忠、陈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顶层谋划、基层实践与学理诠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② 檀学文:《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6期。

情况,这关系到农户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因素^①。对建档立卡户的收入分段结果和建档立卡户的收入构成表进行数理统计分析,样本家户年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有12户27人,人均纯收入超过10000元以上人口也不多,共有31户49人。收入来源的构成集中于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其中经营性收入占比73.68%,工资性收入占比20.00%,财产性收入占比0.63%,转移性收入占样本户收入构成的5.69%。在这些建档立卡样本家庭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五保户有15户,低保户有23户,均按月收到相应的国家政策性补贴,政策惠利到村,成为政策兜底维持生计的特殊群体。工资性收入占比为20.00%,外出务工者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较高。但也面临一个问题:由于务工等原因村庄空心化严重,留守老人、儿童或者留守妇女偏多。被调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常因家庭现有的种植结构不合理或土地贫瘠等原因受限,可耕种土地稀缺且产量不高,不足以维持稳定的生产收益。此外,这些农户还面临着农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和市场供过于求的问题,造成产品滞销^②;同时,由于缺乏议价能力,农民的收入和生产信心极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从转移性收入构成中也可得知,样本农户中转移性收入占比最多的是子女的赡养收入,当地村屯的祠堂修缮非常好,子女普遍孝顺,赡养老人得当。当地扶贫干部对自己帮扶家庭的情况如数家珍,有的第一书记为帮助结对家庭办理产业扶贫项目手续,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奔波忙碌,帮助结对农户解决危房、就医等实际困难。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问卷数据涉及的主体范围限定在政府部门统计的农村建档立卡(脱贫边缘)户这一群体,并以当地行政区划规定划定的村(屯)为初级抽样单位。考虑到数据来源的覆盖范围及抽取的相应困难度,本研究按照非概率抽样(滚雪球)的方法,在G县各个乡镇社区选取了16个样本村,并从中抽取250个建档立卡户,回收问卷250份,其中有效问卷221份,有效率达88.40%。由样本统计可知:调研对象的性别、年龄、就业情况以及教育文化水平、扶贫状况自评等分布合理。此外,对农户的家庭特征、脱贫自评、经济收入状况、生活消费支出、帮扶工作成效满意度和认可度进行相关特征描述分析,并对帮扶生计发展的总体满意度情况进行概括。综上,调查对象覆盖到位,符合G县农村家户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微观数据质量较好(见表1)。

表1 研究样本构成情况

类别	特征描述	百分比(%)
性别	男	50.34
	女	49.66
年龄	≤18岁	15.34
	18—40岁	26.69
	41—60岁	29.40
	>60岁	28.57
就业情况	正常就业	86.00
	失业或待业	6.60
	离退休或无业	7.40
教育文化水平	高中专以上	2.16

① 刘玲、舒伯阳、马应心:《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乡村旅游研究中的改进与应用》,《东岳论丛》2019年第12期。
② 叶敬忠、贺聪志:《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续表 1

类别	特征描述	百分比(%)
	高中	17.40
	初中	61.10
	小学及以下	20.34
脱贫状况自评	很好	19.35
	较好	28.64
	一般	24.67
	较差	23.32
	很差	4.02

(四)研究策略与指标构建

根据“个体禀赋与社会支持”的分析框架,结合英国国际发展署给出的甄别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引入满意度相关测度评价的方法,采取组合赋权对指标聚类分析初选确定的指标量表作进一步筛选。通过对指标评价体系进行主客观赋权,将研究因素按照其属性和重要性进行分解,形成涵盖一级、二级评价指标的满意度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对各评价指标按照重要性程度采用“1—5”五等级打分法进行筛选和评判,得到4个维度的一级指标聚类及20个二级评价指标。

第一,建立递阶层次分析结构模型。通过对帮扶满意度成效这一复杂问题层层递阶,将生存环境、生活条件与社会保障等因素主客观评价进行层次化分析,可以作出更为全面而有效的评价。

第二,构造判断矩阵P。对同一层次上指标要素重要性进行两两比对。按照五等级打分法让专家独立打分作出判断。通过向专家及当地扶贫干部等咨询,按照加权评价法进一步量化分析,其评价指标总分的表达式为:

$$W = \sum_{i=1}^n W_i \quad (1)$$

第三,计算所得指标权重和最大特征值。求出判断矩阵P最大特征根 $\theta_{\max}$ 对应的权重特征向量 $W = \frac{\theta_{\max}}{P_w}$,归一化处理后作为权值,其权重向量公式按照式(2)进行重要性排序:

$$W = \sum_{i=1}^{n=3} W_i = \{W_1, W_2, \dots, W_n\}^T \quad (2)$$

按照式(3)对矩阵P展开一致性检验。

$$CR = \frac{CI}{RI} = \frac{(RI)\theta_{\max-n}}{n-1} \quad (3)$$

结果显示,生计帮扶满意度成效的各指标权重 $CI=0$, $CR=0.0376<0.1$,表明判别矩阵通过检验,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可以被接受。随后,对层次分析所得权重结果进行层次总排序。从得分结果来看,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 B_3 最高,帮扶工作成效 B_4 排序要次于生存环境 B_1 及生计生活状况 B_2 。得分依次为2.56(B_4)、2.64(B_1)、3.59(B_2)和3.73(B_3)。

四、G县脱贫农户生计帮扶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介绍及建构

从满意度理论和可持续生计框架视域出发,分析农户精准脱贫成效,通过系统的满意度影响因素建构模型方程式,展开多维测量指标研究(见图1)。其中,生存环境是帮扶农户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外部资源,于此建立包含对于安居保障满意、基础设施保障、生态环境及卫生条件和交通通信条件的可观测变量,这里基于可变模糊集理论构建评价模型,对二、三级指标的度量建立隶属函数和模糊集,衡

量村级生存环境等反映贫困村作为区域整体在这个维度上的贫困剥夺情况,采用“全部,大多数,半数,少数,几乎没有”来确定各个维度上的评价。生计生活因素包含吃穿、健康状况、经济条件和精神面貌。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主要是满足生计发展目标所利用的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养老、医疗保障、教育保障、能力发展、文娛休闲和技能培训。由于微观数据的限制,这里不具体讨论农村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和其他生计能力感知要素等的影响。最后,由信贷机构、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基层政府构成的工作队驻村帮扶效果、帮扶政策与项目措施瞄准、村两委基层组织工作效果和小额信贷金融帮扶等指标,可以对潜变量扶贫帮扶成效产生影响(见表2)。

结合前文分析建立模型方程式如下,其中式(4)到式(7)为测量方程式,式(8)为结构方程式。

$$Y_1 = \gamma_{11}X_1 + \gamma_{12}X_2 + \gamma_{13}X_3 + \gamma_{14}X_4 + \zeta_1 \quad (4)$$

$$Y_2 = \gamma_{21}X_5 + \gamma_{22}X_6 + \gamma_{23}X_7 + \gamma_{24}X_8 + \zeta_2 \quad (5)$$

$$Y_3 = \gamma_{31}X_9 + \gamma_{32}X_{10} + \gamma_{33}X_{11} + \gamma_{34}X_{12} + \zeta_3 \quad (6)$$

$$Y_4 = \gamma_{41}X_{13} + \gamma_{42}X_{14} + \gamma_{43}X_{15} + \gamma_{44}X_{16} + \zeta_4 \quad (7)$$

$$Y = \beta_{11}Y_1 + \beta_{21}Y_2 + \beta_{31}Y_3 + \beta_{41}Y_4 + \zeta_5 \quad (8)$$

当地农村脱贫边缘户的生存环境 Y_1 、生计生活状况 Y_2 、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 Y_3 、扶贫帮扶成效 Y_4 都是影响生计帮扶满意度评价的重要因素。这些指标都是可以识别且与农户贫困生计结构和满意度成效评价之间相关联的变量。提出假设1:从影响帮扶满意成效的因素来看,农户所处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农户对帮扶成效评价会显著提升。假设2:农户自身的生计和生活状况正向影响他们对帮扶的成效评价。假设3: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帮扶满意成效。假设4:基层扶贫帮扶成效与农户的帮扶满意成效呈正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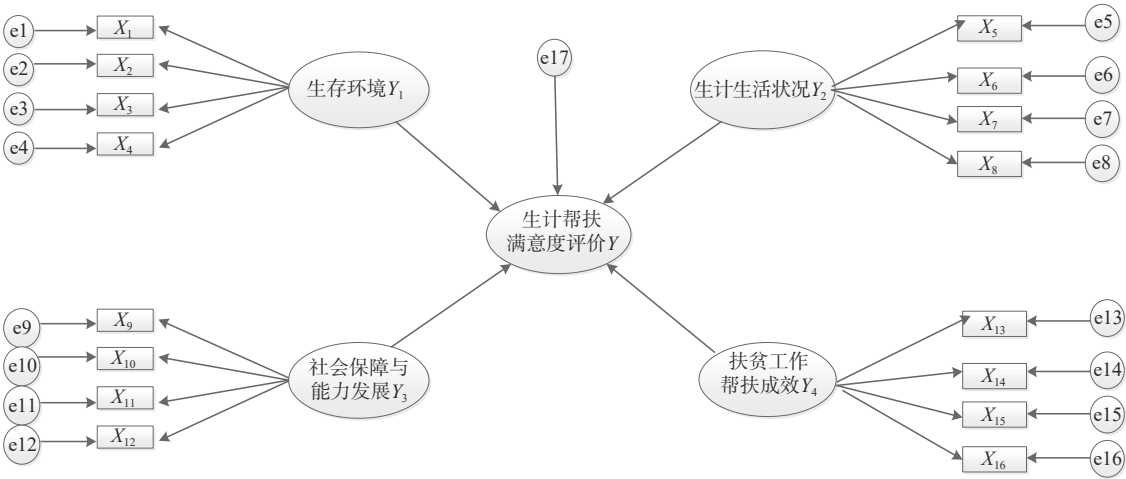


图1 农户生计帮扶满意度评价模型初始图

表2 农户生计帮扶满意度影响因素初始指标

总维度	潜变量	操作变量	可观测变量	相关解释及赋值得分	标准差	均值
生计帮扶满意度评价 Y	生存环境 Y_1	<i>H-s</i>	安居保障状况 X_1	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1.49	3.28
		<i>infr</i>	基础设施状况 X_2	饮水设施、水利灌溉、机械设备等条件与基础保障评价分为ABCDE共5级	1.19	2.99

续表 2

总维度	潜变量	操作变量	可观测变量	相关解释及赋值得分	标准差	均值
		<i>hyg</i>	生态改善与卫生条件 X_3	非常明显=5,比较明显=4,一般=3,不明显=2,非常不明显=1	1.28	3.42
		<i>com</i>	道路交通通信可达性 X_4	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1.31	3.11
	生计生活状况 Y_2	<i>E-w</i>	两不愁(吃住)状况 X_5	指标函数模糊集	1.29	3.07
		<i>hel</i>	健康生计状况 X_6	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1.30	2.86
		<i>eco</i>	家庭发展与经济状况 X_7	就业和经济评价采取虚拟变量,对实际收入状况取对数	1.34	9.05
		<i>spir</i>	精神面貌改善与脱贫信心 X_8	非常高=5,中上高=4,一般=3,不太高=2,低=1	1.14	2.76
	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 Y_3	<i>oth</i>	养老与医疗卫生状况 X_9	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1.25	3.02
		<i>edu</i>	教育升学状况 X_{10}	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对当地教育评价指数采取模糊集	1.54	3.39
		<i>lei</i>	文娱发展与农户闲暇休息 X_{11}	非常好=5,比较好=4,一般=3,不太好=2,非常不好=1	1.28	3.82
		<i>S-tec</i>	相关技能及培训参与 X_{12}	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1.22	3.23
	扶贫工作帮扶成效 Y_4	<i>E-wass</i>	相关工作队驻村帮扶状况 X_{13}	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1.23	3.49
		<i>pro</i>	公共服务配置与扶贫项目措施瞄准 X_{14}	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1.33	3.01
		<i>ach</i>	村基层组织工作与执行效果 X_{15}	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1.51	2.93
		<i>psy</i>	金融信贷工作和小额帮扶 X_{16}	非常有效=5,比较有效=4,一般=3,不太有效=2,无效=1	1.19	2.99

(二)信效度检验

信效度检验采用 SPSS24.0 统计软件处理。其中,各潜变量克伦巴赫 α 系数均在 0.9 以上,组合信度分别为 0.857、0.839、0.912 和 0.866,表明稳定性和可靠性强。效度检验主要对变量相关性的 KMO 统计量进行测度取值。经检验可得,变量 KMO 度量值为 0.957,高于 0.9,且巴特莱球形度检验的指标(Sig. 值为 0.000)低于 1%,各统计变量间偏相关性较强,表明效度可以接受。

(三)因子分析

一方面,对各个因子的提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经过 6 次迭代后模型收敛结果可靠。其中,外生可观测变量对于其影响的潜变量存在显著度和解释作用。选择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前 4 个公因子。因子分析模型的指标累积方差贡献共计达到 80.25%,各个公因子方差解释量均在 19% 以上,能够对 16 个变量有足够的解释能力,说明取值的因子能够涵盖大部分指标的基本信息,所选观测变量对潜变量(因子间效应)的衡量效果较好。

另一方面,因子载荷无交叉,路径也无缺失,因子间相关性系数可被认为是接受的。各变量信度在 0.69 以上,高于 0.5,模型质量理想;平均变异量抽取值,各潜变量均在 0.5 以上,具有较好的收敛

效度,结构方程模型的相对测量误差较小。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下,测验结构方程模型的判别效度。各变量中收敛效度均大于4个潜变量生存环境 Y_1 、生计生活状况 Y_2 、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 Y_3 和扶贫帮扶成效 Y_4 对应的相关系数值。综上,结构方程模型各维度间的效度得到验证,模型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指标^①。

(四)模型拟合与评价

对各可观测变量 X_1 — X_{16} 和潜变量 Y_1 — Y_4 之间展开模型实证分析。由一阶验证性因子模型通过收敛效度检验和区别效度检验,16个观测变量的各因子旋转载荷最小值在其对应的公共因子上均大于0.5,并且4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均通过检验,可以说明各个维度既能在各自测度的变量涵盖下影响因素的不同方面,同时结合探索性因子分析中边缘农户生计帮扶满意度成效因素指标体系初始模型各个潜变量生存环境 Y_1 、生计生活状况 Y_2 、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 Y_3 、扶贫帮扶成效 Y_4 的内涵,又能同时反映农户生计满意度成效评价这一相同内容^②。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参数估计、拟合及检验,给出二阶验证性因子模型各指标与路径系数(见表3),由各变量之间的标准误差、临界比率值及显著性水平可以得知观测变量对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对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进行拟合评价,如表3中拟合指标所示:第一,各观测数据可以契合,绝对拟合度、相对拟合度和简约拟合度评价指标的拟合度根据学者给出的拟合评价指标数据体系均能满足要求^③。第二,根据计算所得的各标准化残差值(S.E)均小于2.58,模型的内在质量较为理想,所设置4个潜变量是合理的,这也与上述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公因子结果相匹配一致。

表3 模型的路径系数及各参数值

变量因果关系	路径符号	未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率值	显著性	标准化路径系数
$X_1 \leftarrow Y_1$	$\gamma_{11} <$	1.185	0.065	16.529	***	0.563
$X_2 \leftarrow Y_1$	$\gamma_{12} <$	1.151	0.063	18.002	***	0.685
$X_3 \leftarrow Y_1$	$\gamma_{13} <$	1.195	0.062	17.349	***	0.456
$X_4 \leftarrow Y_1$	$\gamma_{14} <$	1.044	0.060	17.236	***	0.626
$X_5 \leftarrow Y_2$	$\gamma_{21} <$	1.035	0.068	16.953	***	0.726
$X_6 \leftarrow Y_2$	$\gamma_{22} <$	1.066	0.059	19.693	***	0.908
$X_7 \leftarrow Y_2$	$\gamma_{23} <$	0.987	0.057	18.122	***	0.836
$X_8 \leftarrow Y_2$	$\gamma_{24} <$	0.962	0.072	13.645	***	0.721
$X_9 \leftarrow Y_3$	$\gamma_{31} <$	0.965	0.069	13.826	***	0.676
$X_{10} \leftarrow Y_2$	$\gamma_{32} <$	0.967	0.071	13.655	***	0.621
$X_{11} \leftarrow Y_3$	$\gamma_{33} <$	1.033	0.037	27.845	***	0.576
$X_{12} \leftarrow Y_3$	$\gamma_{34} <$	0.746	0.049	15.225	***	0.745
$X_{13} \leftarrow Y_4$	$\gamma_{41} <$	1.089	0.052	15.775	***	0.673
$X_{14} \leftarrow Y_4$	$\gamma_{42} <$	1.362	0.101	13.229	***	0.951
$X_{15} \leftarrow Y_4$	$\gamma_{43} <$	0.939	0.054	16.558	***	0.833

① 王晓川、陈荣秋、江毅:《网络品牌社群中的创新活动及其前因与后效研究》,《管理学报》2014年第4期。

② 裴婷婷、陈英、吴玮等:《农民土地价值观研究——概念界定、量表开发与效度检验》,《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3期。

③ 徐冬梅、林杰、刘豪:《基于农户满意视角的精准扶贫成效评价》,《统计与决策》2020年第17期。

续表 3

变量因果关系	路径符号	未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率值	显著性	标准化路径系数
$X_{16} \leftarrow Y_4$	$\gamma_{44} <$	-0.058	0.026	-3.587	**	-0.068
$Y_1 \leftarrow Y$	$\beta_{11} <$	0.932	0.086	10.032	***	0.263
$Y_2 \leftarrow Y$	$\beta_{21} <$	0.995	0.085	12.884	***	0.441
$Y_3 \leftarrow Y$	$\beta_{31} <$	0.987	0.067	11.164	***	0.285
$Y_4 \leftarrow Y$	$B_{41} <$	0.774	0.126	6.446	***	0.158

注:***、**分别表示路径系数在0.01和0.05的水平上显著。

最后,主要评价拟合好坏指标例如近似误差均方根小于0.1,拟合优度指标大于0.9,SRMR、NFI、CFI以及AIC等拟合值均满足各拟合优度的值域,这表明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较优(见表4)。此外,模型的绝对拟合评价以及相对拟合评价还有简约拟合度评价,数据也均符合假设适配的标准。

表4 验证性因子模型拟合指标数据

指标	统计检验量	拟合指标	判定标准	是否符合标准
绝对拟合度	卡方统计量 χ^2 (CMIN)	461.00(0.000)	越小越好(P<0.01)	是
	调整卡方 χ^2 /DF	3.871	<5	是
	标准残差均方 SRMR	0.053	<0.08, 越小拟合越好	是
	近似误差均方 RMSEA	0.092	<0.10, 越小拟合越好	是
相对拟合度	标准拟合指标 NFI	0.896	>0.80, 越接近1越好	是
	比较拟合指标 CFI	0.912	0.90~0.95	是
	增值拟合指标 IFI	0.902	>0.80 越接近于1越好	是
	非规范拟合指标 TLI	0.897	>0.80 越接近于1越好	是
简约拟合度	赤池信息准则 AIC	1056.181	越小越好	是
	一致 AIC 准则 CAIC	2230.641	越小越好	是
	交叉验证指数 ECVI	4.346	越小越好	是

(五)结果分析

由实证结果可知,一阶因子生存环境、生计和生活状况、人文发展与社会保障以及基层扶贫帮扶成效对农户满意度影响的路径系数均大于0,表明影响精准扶贫成效认可指标的潜变量对精准扶贫成效认可指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存环境 Y_1 、生计生活状况 Y_2 、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 Y_3 、扶贫帮扶成效 Y_4 是生计帮扶满意度成效评价的影响因素,而且各个测度指标都是可以识别且具有农户贫困生计结构和满意度成效评价之间相关联的变量。各测量模型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在0.5以上,表明4个维度上的可观测变量均能较好地阐释其对应的维度,量表中各个变量均是构成生计满意度成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扶贫工作质量保障和满意度成效提升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各个可观测变量之间能够较为完全地反映其相对应的潜变量。通过模型可以证实的是,影响脱贫边缘农户的4个维度潜变量对农户生计帮扶满意度成效评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得以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思考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脱贫边缘农户”为分析单元,以村级基本单位作为研究场域,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满意度理论,运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识别影响农户帮扶满意度的多维度多层次因素特征,重点考查了健康、教育、消费、居住环境和生态等对提高帮扶满意度成效的认可。结合模型统计,对指标权重进行测度可以看出,农户对于各项脱贫指标评价满意的需求存在较为明显的优先序。具体结论如下:

1.农户自身的生计和生活状况对帮扶满意度的影响

根据实证结果,模型丰富了在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中脱贫户生计和生活状况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农户的吃穿情况、健康状况、脱贫精神面貌改善与脱贫信心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与其生计生活状况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从影响生计满意成效的因素来看,脱贫农户的生计生活发展至为关键。总体而言,经济问题和生计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关键影响因素,也决定了脱贫人口生活品质的提升。产业增收困难、非农就业机会少、农业产业化和职业化技能培训力度不够、农户脱贫信心不足容易导致返贫风险。从正向谐变的视角出发,测度指标都是可以识别且具有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结构和满意度成效评价之间相关联的变量。这些因素对参与满意度测评的脱贫农户生计状况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基础设施、卫生医疗资源、乡村图书馆及乡镇文化馆等基本公共服务配置,需要依靠各级政府和多部门共同发力,这在下一步脱贫政策调整方面应给予高度关注。

2.生存环境、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对帮扶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比较全面地验证了生存环境、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等各个变量正向影响农户的生计满意度的假设,变量之间观测指标也具有较好的测量能力。资源的有限性要求社会必须合理配置资源,这为脱贫农户生计满意度与生存环境条件、社会保障与能力发展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经济学的解释。一方面,生存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改善的重要约束条件,没有生存环境的基础条件,扶贫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也就缺少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文水平的提高带来扶贫效益增长,间接地对环境需求和改善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强化对脱贫农户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等金额标准和覆盖面的扩围增效,扶贫效益特别是经济效益的提高与生存环境、社会保障及能力发展之间可以实现协调发展,有利于改善脱贫农户的生存条件。从结果来看,安居住房保障满意度、基础设施条件、生态环境及卫生条件等变量的改善标志着农户生存环境的提升和对生计满意成效评价认可的上升。关乎农户自身内生发展的教育、技能培训、文娱休闲等能力发展指标和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观测变量,同样也与农户的生计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3.基层组织和扶贫帮扶成效对帮扶满意度的影响

本研究从治理有效的维度,选择以脱贫攻坚、防止返贫为核心的乡村贫困治理,以加强预防村两委干部腐败、协调社会矛盾纠纷为核心的乡村基层治理和以公共服务条件保障为核心的乡村民生治理三位一体的成分指标评价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对于扶贫项目决策和村基层事务参与来说,其显著性水平如果呈现较低拟合系数,基层工作治理涣散、党员队伍及组织发展后继乏人、村民归属感弱化、乡村黑恶势力和宗族主义抬头等既可能带来返贫风险,也是影响扶贫成效满意评价的因素。随着改革的深入,乡土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正在转变为半熟人、半陌生人社会^①,乡村事务行为主体的异质性、复杂性增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某些要素已难以适应发展的要求,亟须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构建包括农户、基层政

^① 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求实》2019年第2期。

府和市场等在内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以强有力的党建引领基层组织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由于村民参与治理的群团组织与各类协会尚未充分发挥出其应有效能,在部分项目决策中村民的个人能动性有待激发。有效推动以加强预防村两委干部腐败、协调社会矛盾纠纷为核心的乡村基层治理,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和金融、文化、社会公共服务等乡村民生治理形成了对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双重考验。

(二)政策思考

后脱贫时代仍然存在不少难题与挑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预防规模性返贫,提升农户生计福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应从生计可持续发展、思想观念转变、帮扶满意度提升等方面入手,实施多维提升策略以防范边缘户返贫。

1. 坚持推进“产业扶贫+产业兴旺”有机衔接,建立脱贫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的有效策略

与脱贫农户生计和生活状况相关联的产业因素,对脱贫农户的生计满意度和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坚持“产业扶贫+产业兴旺”有机衔接,建立起依托产业振兴的可持续生计发展策略。首先,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脱贫农户针对性就业帮扶。不断巩固拓展产业扶贫成果,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推动扶贫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建立农产品精深加工体系,提升产业链附加值,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①。进一步强化就业帮扶措施实效性针对性,为脱贫农户提供就业帮扶车间,给予包容性和益贫性的劳动条件,帮助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加收入。其次,要加强脱贫农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培训。建立“专家工作站+田间学校”培育体系,在中心乡镇设立就业服务驿站,提供权益维护、专家指导等提升一站式服务;加大以工代训、以训稳岗的农业产业职业化技能培训力度,提高脱贫农户的劳动素质与能力^②。最后,要内外结合提升脱贫农户生计发展能力。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形势,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解决好农产品销售难题,鼓励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开展产品直销。通过“社会输入型干预+农户内源式发展动力”有效结合驱动建立起可持续的生计发展策略^③,形成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户就业增收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现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的根本转变,不断提升农村脱贫人口的生计发展能力。

2. 扎实提升“社会保障+风险预警”协同机制,加强脱贫农户返贫诱因精准识别分类施策

要达成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要求,扎实提升“社会保障+风险预警”协同机制意义重大。首先,健全防止返贫的动态信息管理和监测。加强对脱贫农户返贫诱因的精准识别,依法依规将五保户、低保户和其他贫困弱势群体充分纳入制度性救助体系,通过转移支付、实物供给等方式保障基本生存需求,保障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活,防止他们重新陷入贫困边缘。其次,构建和完善农村社会减贫大治理体系。重点建立基于风险矩阵的可持续生计返贫监测预警模型,通过生存环境、生计生活状况和社会保障条件等多维度多层次考察,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以及民族聚集地差异,实施差异化预警响应;重点关照农村老、妇、病、残等群体的综合保障水平,建立专项帮扶档案,加强其在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方面的风险抵御能力,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此外,推动建立及时、有效、动态清零和稳定可持续的防返贫机制。在借鉴西方国家相对贫困治理经验的同时,对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标准的测度和返贫预警应秉承“差别化、动态化和多维度”的原则,注重利用空间资源、科技、环境要素和优势,及时调整并采取相应的针对性帮扶措施;将返贫预防和扶贫开发工作置于各级政府工作首位,把消减规模性返贫风险和提升脱贫主体素质当作重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人民日报》2025年2月23日,第1版。

② 左停、古丽尼孜·阿里木:《共同富裕愿景下增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福利的政策创新——基于三次分配分析框架》,《云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③ 张明皓、叶敬忠:《迈向共同富裕的县城城镇化:逻辑理路、实践样态与发展路径》,《农村经济》2023年第10期。

要的工作考核指标^①,通过建立严格考核问责机制确保扶贫工作质量。最后,注重脱贫农户能力建设,降低脱贫农户的风险性和脆弱性。通过制度化扶贫落实长期有效的帮扶政策,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和抗逆力,聚焦帮扶机制和瞄准机制相结合,以风险分散机制协同治理相结合,依托政策赋能的形式,针对不同返贫风险制定并落实相应的巩固政策,选择行之有效的风险分担工具,从而有效缓解返贫风险对标的群体的影响和冲击^②。

3. 推动实施“组织振兴+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为防范脱贫农户返贫提供治理支撑

作为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是国家治理中最基本且至关重要的治理单元。为此,要通过组织振兴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防范脱贫农户返贫提供强力支撑。首先,强化组织体系建设夯实治理基础。依托强有力的各层级组织体系、制度和责任建设以提高帮扶成效,按照“治理有效”目标不断提升对农村基层组织治理水平,优化各类涉农督查检查考核,突出实绩实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建设,这既是精准扶贫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后脱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其次,增强数字赋能创新乡村治理模式。依托数字媒体如网络、电视、广播等及时向农户传达信息或征求意见,使他们能够广泛参与乡村事务及制度建设。增强治理的透明度与公正性,充分激活乡村治理的社会参与性,重建村落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秩序,有效助力乡村实现再组织化,提升乡村治理成效。再次,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增强乡村治理动能。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加强农村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培训和建设;有效挖掘乡土文化资源,重塑善治,转变农户思想观念,传承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强化精神扶贫夯实建设主体,提升脱贫致富信心和决心;加强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提升乡村文化治理能力与组织框架。最后,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以多方协同合力推动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③,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提升乡村治理综合效能。

Study on th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Livelihood Assistance for Poverty-prone Farmers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Against Poverty Recurre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G County

Xing Zhanjun^{1,3} Lin Jie^{2,3}

(1. Smart State Governance Lab,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P.R.China;

2. Quality of Life and Public Research Center,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P.R.China;

3.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P.R.China)

Abstract: A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ask is accomplished, preventing households lifted out of poverty falling into poverty again in a large scale is the top priority and bottom-line requirement for

① 杨永伟、邢占军:《中国共产党的减贫事业:实践历程、基本经验与前景展望》,《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 左停、李泽峰:《风险与可持续生计为中心的防返贫监测预警框架》,《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页。

further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ing the achievement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teadily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undeniable that relative poverty remains a persisting issue 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with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such as fragility, instability and non-sustainabi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survey in G County and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a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system for farmers' livelihood assistance is constructed 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its impact path is examined. It is found that factors such as living environm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atisfaction of farmers with assistance. Based on this, star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development,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ssistance satisfaction, multidimensional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eventing marginal households from returning to poverty warning are proposed.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linkage betwee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effectively combine social input intervention and farmer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echanisms to driv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boost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functions.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solidly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risk warning, strengthen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auses for poverty-stricken farmers lifted out of poverty falling into poverty again, establish poverty relaps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framework centered on risk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institutionalize the long-term effective dynamic management of assistance information. Thirdly,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as strongholds,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ittee teams and grassroots village organizations, rebuild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order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alent tea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ectively tap into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stimulate the motivation for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 good situa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multiple parties.

Keywords: Farmer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apacity;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with assistance

[责任编辑:陆 影]